

景村融合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 冲突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以肇兴侗寨为例¹

张 戡¹ 赵振斌^{※1} 刘 阳¹ 李小永²

(1.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19;

2. 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 中国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景村融合发展使得乡村社区人地关系产生剧烈变化, 社区内部冲突日益频繁, 从主客视角解构社区冲突构成及其空间特征, 有助于社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文章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 利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与游客进行调查, 综合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 通过双变量等值区域制图法, 从主客视角出发识别景村融合背景下社区冲突的构成类型, 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 ①社区居民与游客反映的冲突可以归纳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 但两个群体在冲突构成类目上存在差异, 社区居民反映的冲突类目聚焦于旅游开发对其权益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游客反映的冲突类目聚焦于旅游期望无法满足而产生的负面体验; ②各类型冲突的空间分布模式存在差异, 管理冲突在空间上呈现沿主街道的多核心带状重叠分布与在社区边缘区域和旅游设施相对落后区域的未重叠分布模式, 文化冲突呈现以景点等为高值核心的圈层式重叠分布模式, 环境冲突在空间上呈现未重叠分布模式, 社区居民反映的该类冲突主要沿河流分布, 集中于河流上下游和人工湖, 游客反映的该类冲突以主街上的十字路口和小巷为核心, 沿道路呈条带状分布; ③景村融合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冲突空间是以旅游开发为先决条件, 在管理者以资源禀赋决定空间利用形式的基础上, 主客群体基于差异化诉求并依赖空间物质载体开展实践所形成的。

【关键词】: 旅游开发; 景村融合; 社区冲突; 居民与游客; 空间结构; 文化冲突; 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22) 11 - 0216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22.11.023

旅游作为乡村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社区重构的驱动力,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1,2]。中国西部民族乡村社区凭借独特的地方性资源, 以社区的生产生活空间作为旅游开发对象^[3], 引入游客、企业、旅游协会等外来利益相关者, 促进社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旅游要素与乡村要素在空间上集聚与交融, 景区的开发建设带动乡村社区的发展, 最终实现社区与景区在空间、功能与产业上的融合发展^[4]。在“景”和“村”双重属性的作用下, 社区原有的空间利用与社会关系受到冲击, 利益相关者围绕空间的博弈与争夺日益激烈, 由此导致的冲突和抵抗行为已严重阻碍社区旅游可持续健康发展^[5,6]。因此, 社区

¹ **【摘要】**: 2022 - 08 - 24; **【修回时间】**: 2022 - 10 - 3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9712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2020TS098)

【作者简介】: 张戡 (1995—), 男, 河南西峡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E-mail: zhangjian0726@snnuedu.cn

【※通讯作者】: 赵振斌 (1965—), 男, 陕西洛南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社区旅游。E-mail: zhaozhib@snnu.edu.cn

与景区的融合成为部分乡村旅游社区冲突产生的先决条件^[5]，从游客与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东道主视角出发，科学地认识社区景村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冲突空间分布特征，能够指导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对降低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助力社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景村融合背景下乡村社区的空间重构、发展模式、利益分配一直是旅游开发研究的重要内容^[7,8,9]。近年来，随着公众对乡村旅游社区冲突事件的广泛关注，景村融合导致的社区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3,10]。冲突是不同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利益诉求、价值观念、资源利用等不相容，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对立或对抗性行为^[11]。景村融合过程中社区冲突的类型划分、影响因素和管理应对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类型划分方面学者们以实证研究为主，多通过深度访谈获取数据并辅以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5,12]，研究内容由单一案例的深度总结转向多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归纳^[9,13]，而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等要素是学者们进行冲突类型划分的关键依据^[14]，如 Tsaur 等通过对已有冲突概念和类型的总结，将社区冲突分为文化冲突、社会冲突和开发冲突^[15]。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多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增权理论等构建概念分析模型^[16,17]，探究空间资源、旅游参与机会等要素对冲突的影响^[18]，已有研究指出社区冲突是外部制度与内部关系共同影响的产物^[19]，但当前仍缺乏广泛接受的涵盖内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在管理应对方面，学者们多基于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20,21]，在明晰社区不同旅游开发阶段的冲突演化历程与成因的基础上，从管理模式、利益分配模式（群体间和群体内部）以及旅游资源利用模式等方面^[22,23]，提出社区冲突治理的实践参考。

当前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视角和内容上的局限。首先，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社区居民在景村融合过程中体验到的冲突，而对游客群体冲突关注的关注略显不足；其次，乡村社区旅游开发过程的非均质性使空间成为多群体竞争的稀有资源，由此导致的社区冲突具有明显的空间特性^[24]，但当前旅游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在当前乡村旅游景村融合的发展背景下厘清旅游社区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冲突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丰富旅游开发研究的理论体系，实现旅游社区内部空间的精细化管理。

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当地乡村社区逐步与景区融合，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利益主体在征地、门票分红、房屋修葺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对景区管理、文化展示、居民不良行为等存在较大不满情绪，导致社区内部冲突频发，而社区居民和游客关注空间的差异使社区冲突存在空间分异。基于此，本文选取肇兴侗寨为案例地，从主客群体视角出发综合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辨识景村融合背景下主客群体体验到的社区冲突类型并明晰其空间分布特征，总结冲突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以期社区空间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助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东南部，距县城 70 km 左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独洞河顺地势穿寨而过，村寨沿河呈帆船细条状分布，占地面积为 18 万 m²，是黔东南地区最大的侗族村寨。寨内自西向东分为“仁、义、礼、智、信”5 团，各团均建有鼓楼和风雨桥（图略），寨内侗族传统习俗与建筑保存完整，素有“侗乡第一寨”之美誉。肇兴侗寨的旅游开发经历了发现期（1980—1989 年）—起步期（1990—1999 年）—扩张发展期（2000—2013 年）—优化提质期（2013 年至今），旅游开发使得侗寨的物质景观产生显著变化，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步向旅游生产转变。2013 年黎平县政府成立贵州省黎平县肇兴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规范化管理与运营，2014 年开始实施售票经营，2014—2017 年当地政府先后完成人工湖修建与侗族文化展示中心等提升项目，并对侗寨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2018 年肇兴侗寨作为春晚分会场登上央视，在春晚效应的带动下，游客量显著提升，门票收益逐年增加。2020 年肇兴侗寨全年共接待游客 120.45 万人次，旅游综合总收入达 10.42 亿元。目前，肇兴侗寨的旅游发展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非均质性，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其中，西起人工湖东至仁团风雨桥的河流与主街两侧的带状区域，是旅游开发的核心区，主要景点集中分布于该区域，游客在此较为集中，而其他区域缺乏景点，游客到访较少，开发相对缓慢，是旅游发展的边缘区。

1.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2013 年首次在研究区调研了解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情况，之后持续关注研究区的旅游发展，2014—2018 年肇兴侗寨经历了优化提质期，使得研究区内部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旅游开发所带来的问题与矛盾不断凸显，为厘清研究区的冲突状况，课题组制定调研方案与工具并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开始为期 11 天的现场正式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本次调研对象为社区居民和游客，调研工具包括比例尺为 1:750 标注典型地物的研究区卫星影像图、带有注记（A~K）的不干胶贴片以及包含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半结构访谈问卷。负面情绪是冲突的直接反映，在冲突发生时，冲突一方或双方会产生负面情绪，其能够较好反映冲突且对于调查对象的敏感性较低，便于通过访谈的形式获得^[25]。因此，本文从负面情绪着手识别社区冲突，将访谈的核心问题确定为：在当前旅游开发背景下，寨子里让您觉得不满意/不高兴/有意见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在实际调研中，由调研人员向受访者简要介绍调研目的，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访谈并录音。首先向受访者展示研究区卫星影像图，并帮助其读图；然后开展访谈，当受访者表述不满意的地方时，邀请其在卫星影像上用不干胶贴片进行标注（数量不限）；随后，询问受访者标记该地点的详细原因并记录；最后，了解并记录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1.3 研究方法

1.3.1 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的调查目的是明晰游客和社区居民两个群体在社区中感知到的冲突，参与式制图能够获取两群体感知冲突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而半结构访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弹性调整访谈内容，获取丰富的访谈数据。因此，本文通过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调研对象的选取采用分层抽样法，以保证社区居民和游客人数相当，且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空间分布的相对均匀，确保访谈与填图结果的代表性和有效性。由于样本中部分社区居民使用普通话进行访谈存在困难，课题组邀请 2 位当地居民作为侗语向导辅助开展访谈。本次调研共获得 596 套有效问卷和填图，其中社区居民 299 套，游客 297 套。

1.3.2 数据分析方法

①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本文使用 NVivo11 软件开展扎根理论的编码工作，具体过程包括：将获得的游客和社区居民的访谈录音进行文本化处理，并分别进行开放式编码，通过访谈文本的逐句阅读分析，将与负面情绪表达相关的句子提取出来，之后逐句进行编码、概念化以及范畴化。将获得的初始编码与 4 位旅游管理专业的专家学者反复探讨后，对初始编码进行多次修正、提炼与归纳，最终两个群体各形成 11 个开放式编码。利用软件中的编码分析功能探讨开放式编码间的联系，并依据指向性与逻辑性的原则对开放式编码进行抽象和整合，最终两个群体各提炼出 4 个主轴编码。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6]，综合考量原始语句与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结果，将核心范畴确定为“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并提炼整合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三种社区冲突类型。

②质性数据空间分析。首先对编码得到的冲突类目进行编号，其次识别编码与对应问卷访谈内容的归属关系，并按照访谈内容与空间点的对应关系，将唯一的冲突类目编号赋予对应的点数据，并通过 ArcGIS 对点数据进行矢量化时将冲突类目编号输入属性库中进行对应，将空间属性赋予质性分析结果，实现质性数据的空间化^[27]，为后续空间制图分析提供基础。

③核密度分析。参考已有研究^[25,27]，采用 Arc-GIS 核密度分析工具，以居民和游客冲突类型点数据分别作为输入图层，设置输出栅格大小为 10 m，搜索半径为 50 m，分别得到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各类型冲突分布核密度图。

④双变量等值区域制图法。借鉴已有研究^[28]，本文将游客和居民体验到的各类型冲突分布核密度图进行叠加，用 HSB 色彩空间显示叠加后各类型冲突的空间分布状况，以此识别景村融合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冲突的空间特征与属性关系。

2 结果分析

2.1 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类型构成

通过扎根理论对获得的 596 套有效问卷的访谈内容（不满意的地方及原因），按照社区居民与游客分别进行编码，社区居民共得到 954 个编码节点，游客共得到 1 268 个编码节点。依据冲突内容的异同，最终归纳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 3 种类型，社区居民与游客在各类型冲突的构成类目上存在差异，但均反映出该群体在社区中体验到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矛盾（表 1）。

表 1 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类型构成类目

类型	社区居民			游客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频次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频次
管理冲突	空间利用失范	空间开发滞后	159	景区管理失范	景区分区混杂	132
		空间管理混乱	127		游览空间杂乱	104
	硬件设施落后	95	旅游消费价高		53	
	进出村寨限时	111	服务意识淡薄		26	
	日常行为受限	房屋修建受阻	68		基础设施落后	162
文化冲突	地方特色淡化	生活规范增多	54	旅游设施滞后	配套设施缺乏	141
		稻田景观消失	103	文化保护欠缺	174	
		建筑特色丧失	72	文化传承遗失	文化展示匮乏	170
		民族文化凋敝	61	文化开发不足	48	
环境冲突	生态环境恶化	水质变差	53	环境污染严重	街道脏乱	185
		卫生较差	51		生态破坏	73
总计			954			1 268

2.2 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为识别各类型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社区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的分布范围与聚集程度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将获得的三类冲突核密度图层分别进行双变量等值区域制图，以期厘清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

2.2.1 管理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①以旅游设施为核心，沿游览线路带状重叠分布。管理冲突重叠区域以寨门、主街路口、侗族大歌演艺中心为核心高值区，停车场（南部）、观景台、肇兴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为次高值区，呈现出沿主街的多核心带状重叠分布模式（图 1）。寨门作为进出社区的唯一路径，社区居民仅能凭证在规定时段进出，导致社区居民对进出村寨限时的不满在此集中分布，而游客在寨门购买门票与乘坐观光车，由于票价较高其在此体验到旅游消费过高，两种冲突类目的集中分布，使寨门成为核心高值区。主街路口作为游览的起点，景区管理者严格控制路口周围房屋的外观，社区居民认为在旅游开发后房屋修建受阻，由于路口缺乏导览图、指示牌等设施，游客感知到基础设施落后，两种冲突类目的集中分布，使主街路口成为核心高值区。在侗族大歌演艺中心周围居住的居民被禁止在门口停车和摆放物品，而演艺的噪音影响其生活，居民采用锤布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干扰演艺。社区居民反映旅游开发后其生活规范增多，而游客认为游览区域未与居民生活区域区分，体验到景区分区混杂，两种冲突类目在

演艺中心聚集，使其成为核心高值区。停车场（南部）、观景台、肇兴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为旅游开发后修建的设施，但缺少维护和管理，设施的功能较难发挥，社区居民反映硬件设施落后，而游客体验到配套设施缺乏，两种冲突类目相对聚集，使上述地点成为次高值区。主街街道是社区居民主要的生活空间，旅游开发后成为游览空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生活空间与游览空间相互竞争，社区居民和游客均认为空间管理混乱，两者体验到的管理冲突在主街范围内广泛重叠，最终形成沿主街的带状分布模式。

②以基础设施为核心，在社区边缘团状分布。仅社区居民群体反映的冲突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社区的边缘位置（图1），如东部稻田、肇兴镇中心小学、停车场（北部）。东部稻田被征收后开发进展缓慢，使社区居民产生失地困扰，导致其体验到的空间开发滞后在此聚集，成为冲突高值区；肇兴镇中心小学原本位于社区核心区域（侗族大歌演艺中心），旅游开发后向南搬迁约800 m至社区的边缘区域（图幅外），位置相对偏僻且存在洪灾风险，社区居民对此有较大的不满情绪，导致小学成为社区居民体验到空间管理混乱集中分布的地点，成为冲突高值区；停车场（北部）主要服务于社区居民，但是面积较小且缺乏管理，社区居民体验到硬件设施落后，成为冲突高值区；人工湖由稻田改建而成，其周边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社区居民体验到的空间开发滞后聚集于此，成为冲突高值区。

③以主街十字路口为核心，沿主街环状分布。仅游客群体反映的冲突高值区呈现以主街上多个十字路口为核心，仁团、义团鼓楼与风雨桥为次核心的环状空间分布模式（图1）。主街上多个路口缺少指示标牌，游客难以辨别道路，感知到的配套设施缺乏在此集中，成为冲突核心；仁团、义团鼓楼与风雨桥作为主要的游览景点，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发现休息与观景设施被社区居民占用，其反映的景区分区混杂在此集中分布，成为冲突次核心；社区居民沿主街摆摊经营，但缺乏统一的管理，摊位分布杂乱，同时主街东部的房屋多在翻修，建筑材料在街边乱放，导致游客体验到的游览空间杂乱在主街区域内沿游览线路广泛分布，最终形成环状空间分布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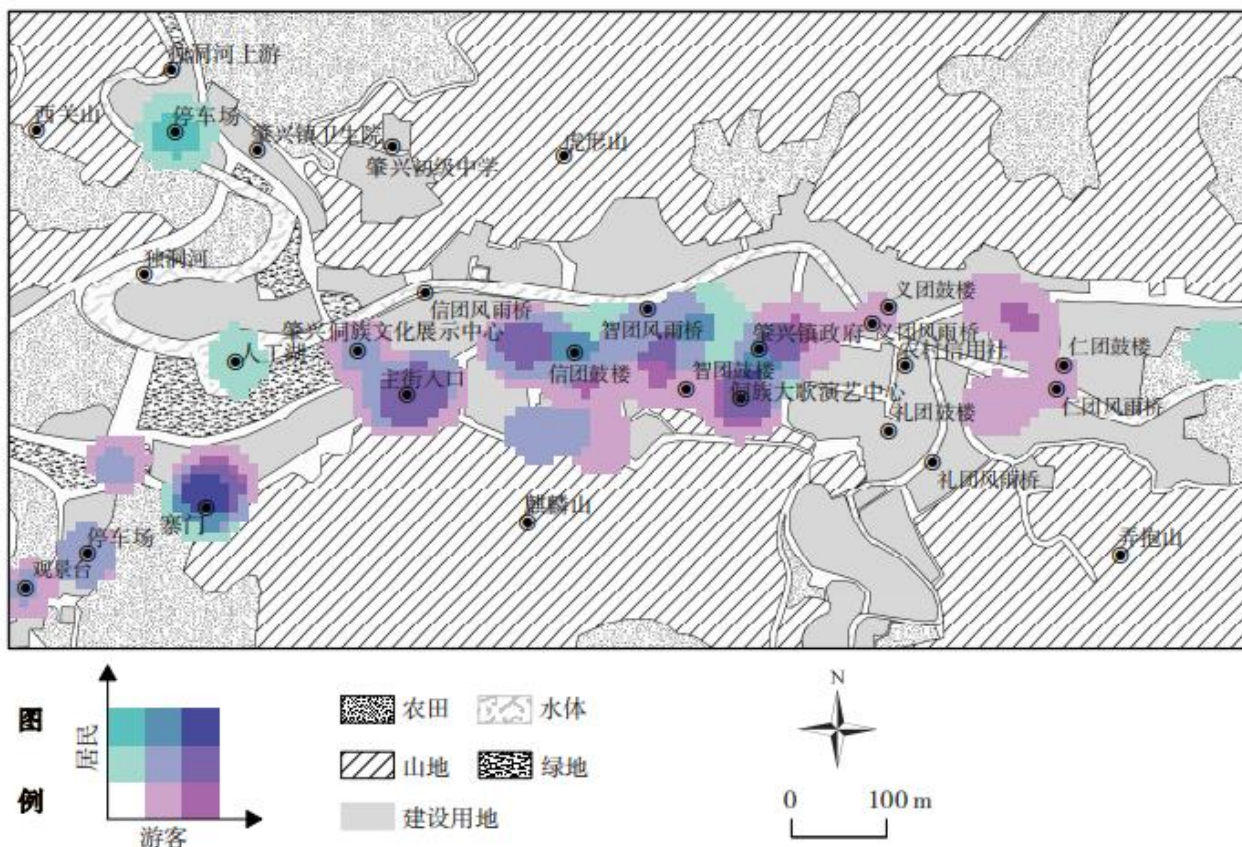


图1 管理类冲突双变量等值区域图

Fig.1 Bivariate equivalent regional map for managing conflict

2.2.2 文化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①以景点和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圈层式分布。文化冲突在空间上基本重叠，以主街入口、肇兴镇政府和主要景点（鼓楼、风雨桥、演艺中心和文化展示中心）为高值核心并向周围逐步降低，呈现以高值核心为中心的圈层式分布模式（图2）。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沿主街分布，旅游开发后为预防火灾隐患、提升居住空间并降低建造成本，主街入口周围部分当地传统的木质房屋改建为砖混结构，社区居民担心传统建筑特色丧失，而游客看到居民对传统房屋的毁坏式重建，认为文化保护欠缺，两种冲突类目的集中分布，使主街入口成为高值核心区。肇兴镇政府作为社区管理部门所在地，负责景区的运营与维护，社区居民认为管理者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有待提升，其反映的建筑特色丧失与民族文化凋敝主要集中于此，游客在演艺中心观赏侗族大歌时关注到周围的建筑多为新修且缺乏民族特色，其体验到的文化保护欠缺在演艺中心周围集中分布，多种冲突类目的叠加，导致演艺中心至主街区域成为冲突高值核心。景点是社区文化展示的载体，管理者对景点所蕴含的文化遗产与展示不足，使社区居民感知到民族文化凋敝，游客认为文化保护欠缺与文化开发不足，多种冲突类目的在景点集中，使其成为冲突高值核心。此外，在高值核心附近仍分布同类冲突但密度相对较小，使文化冲突呈现以高值核心为中心的圈层式分布。

②以社区原有稻田为核心的团状分布。稻田作为社区主要的生态景观，承载着传统的稻作生产活动，是社区居民重点关注的物质景观。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稻田被征收修建旅游设施，部分稻田被修建为人工湖，还有部分规划占用稻田的旅游设施仍在施工。由此导致河谷稻田环境与侗寨建筑形成的生态文化景观统一体被破坏，造成侗寨与环境要素割裂，社区传统景观破碎化，社区居民感知到的稻田景观消失在人工湖和东部稻田集中分布，其成为仅社区居民群体感知到的冲突高值区（图2）。

2.2.3 环境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①沿河流的关键节点聚集分布。环境冲突在空间上基本无重叠区域，社区居民体验到环境冲突主要沿河流分布，集中于河流上下游和人工湖（图3）。其中，独洞河上游是社区生产与环境用水的水源地，旅游开发后用水量增加导致水质下降，社区居民反映的水质变差大多分布于此，成为冲突集中地点；仁团风雨桥河段为附近社区居民生产用水的来源，旅游开发后部分酒店直接将污水排入河中，社区居民体验到水质变差和卫生较差，成为冲突集中地点；人工湖是社区内主要的休闲场所，由于缺乏清洁治理导致湖内环境脏乱，社区居民感知到的卫生较差在此集中分布。

②沿主街呈多核心点状聚集分布。游客体验到的环境冲突以主街上的十字路口和小巷为核心高值区，沿道路呈点状聚集分布；此外，东部稻田也有分布（图3）。社区居民多在主街上的十字路口附近摆摊经营，其将废弃物堆放于此，严重影响街道卫生，游客反映的街道脏乱部分集中于此，使其成为核心高值区；主街内部的小巷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旅游开发后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小巷内部堆放较多的杂物，游客反映的街道脏乱在多个小巷内集中分布，使其成为核心高值区；此外，游客体验到的街道脏乱在核心高值附近的区域均有分布，最终呈现沿主街点状聚集的分布特征。东部稻田被征收后，其上修建的设施项目进展缓慢，导致区域的环境卫生变差，社区居民反映的卫生变差在此分布；而游客发现社区东部稻田被破坏式开发，其体验到的生态破坏主要分布于此，主客群体反映的环境冲突在此聚集，使东部稻田成为冲突高值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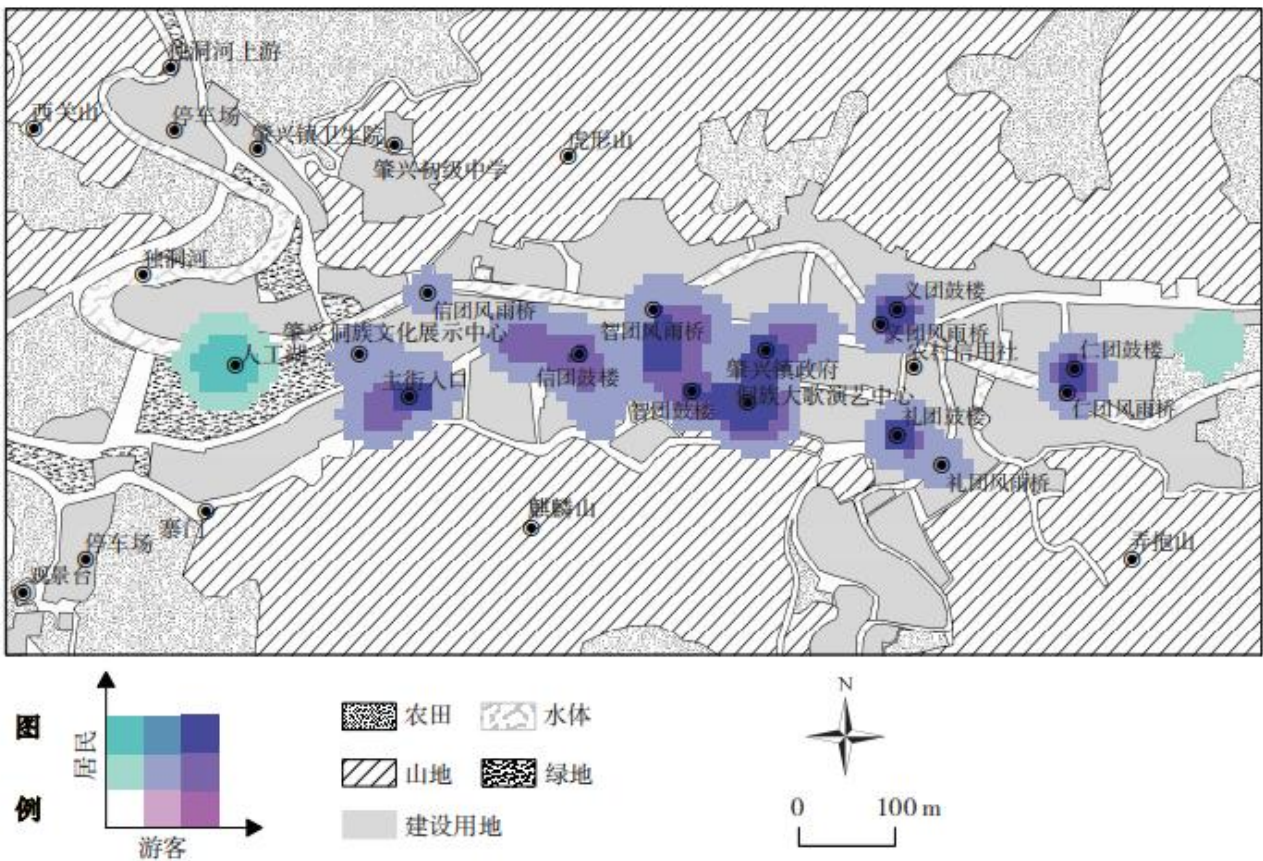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类冲突双变量等值区域图

Fig.2 Bivariate equivalent regional map for cultural confli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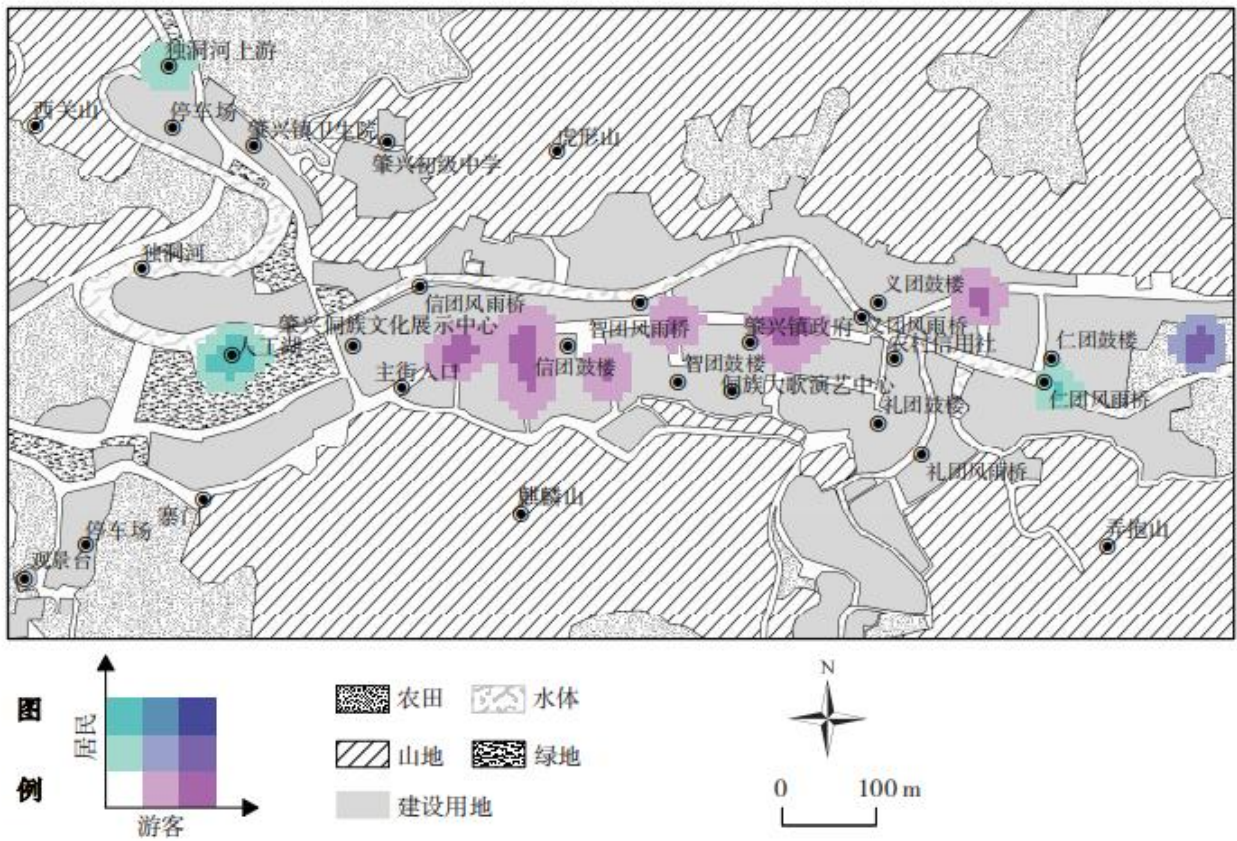


图3 环境类冲突双变量等值区域图

Fig.3 Bivariate equivalent regional map for environmental conflict

2.3 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空间分布形成机制

肇兴侗寨的社区冲突空间分布特征是旅游开发、管理者、资源禀赋、群体诉求差异等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以旅游开发为先决条件，在管理者以资源禀赋决定空间利用方式的基础上，主客群体基于差异化诉求并依赖空间物质载体开展实践所形成的（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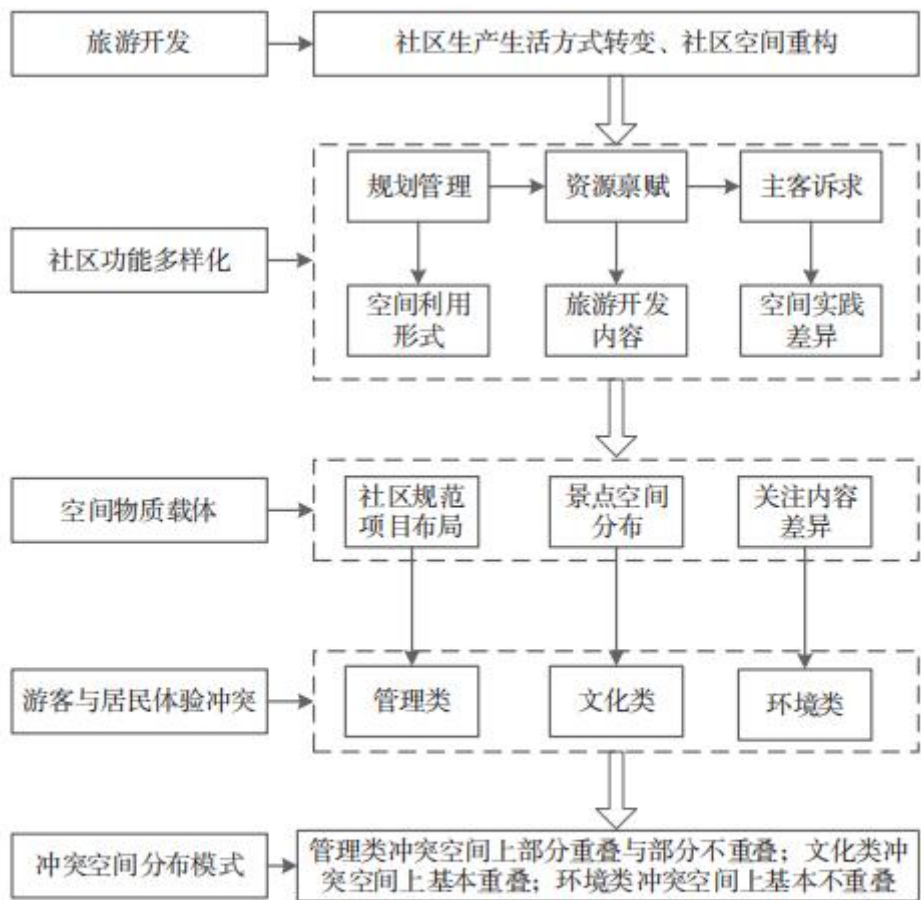


图4 冲突空间分布形成机制

Fig.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flict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旅游开发导致的社区空间重构是冲突空间分布的前提和基础。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的村寨型景区，主街是主要的生产生活空间，也是旅游吸引物主要分布的区域。旅游开发使得主街成为游览空间，为满足旅游发展需要主街上的小学等被迁出，原有空间改建为旅游设施，生产生活空间被迫向游览空间演变，社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空间被侵占式重构，造成生产生活功能逐步边缘化，由于空间重构导致的空间非均衡利用影响冲突在空间上的总体分布。

社区功能多样化是冲突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是社区功能多样化的基础，决定了旅游开发的内容及形式，侗寨内部的鼓楼、风雨桥等传统建筑被开发为景点，独特的文化则通过演艺中心展示，社区空间逐步兼具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两种功能对空间的竞争伴随冲突。规划管理是社区功能多样化的保障和指引，管理者通过规划确定各区域的空间利用形式与功能以保证多种功能的协调发展，如对稻田进行统一规划征收并修建人工湖和文化展示中心，增加功能分区；禁止主街居民私自建房改变建筑风格，以保障旅游功能的顺利开展；而规划对旅游功能的侧重，引发居民群体的不满而形成冲突。主客诉求是社区功能多样化的动力，社区居民关注生活功能的保留而游客则需要社区提供充足的旅游功能，两群体差异化的空间实践使得社区功能逐步多样化，当主客诉求无法通过空间实践满足时，便产生冲突。在规划管理、资源禀赋、主客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管理者主导空间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分区，而部分区域存在不同诉求的空间重叠便产生冲突，导致社区功能对冲突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

空间物质载体是冲突空间分布的依托条件。管理冲突主要依托社区规范与项目的分布而形成，管理者在旅游开发后为侗寨制定新的社区规范并引入新的项目，规范或项目同时影响社区居民与游客时，造成冲突在空间上的叠加，如在寨门增设关卡进行统一管理，社区居民凭证限时进出、游客购票进出，影响两个群体的进出，导致冲突在空间上的重叠；规范或项目仅影响某一群体时，冲突在空间上不重叠，如旅游开发导致社区空间规则化，仅对社区居民的生产活动产生限制，未影响游客群体；社区东部仁团正在修建旅游项目，建筑施工影响游客群体的游览，未直接影响社区居民，冲突在空间上不重叠。文化冲突主要基于景点的分布而形成，侗寨主要的景点由具有地方文化的鼓楼、风雨桥等打造而成，社区居民关注这些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转变为景点过程中对其原有社会交往、公共事务、生产功能与休闲功能的传承与保护，游客想从景点体验到地方文化，但景点无法满足主客诉求，导致主客群体体验到的文化冲突在景点重叠。环境冲突主要基于社区内部主客关注不良环境空间的分布而形成，侗寨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游客大量进入对社区水源利用与环境质量造成压力，社区居民关注的饮水、卫生等主要集中于生活空间，而游客更关注游览空间的卫生状况，导致环境冲突在空间上不重叠。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①在景村融合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冲突可以归纳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但两个群体在冲突的构成类目上存在差异。社区居民体验到的冲突类目聚焦于旅游开发对其权益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游客体验到的冲突类目聚焦于旅游期望无法满足而产生的负面体验，但都因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保护而感知到冲突，表明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展示是主客群体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②从冲突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管理冲突在空间上既有重叠区域又有未重叠区域，重叠区域以旅游设施为核心，沿游览线路带状分布；未重叠区域中仅社区居民体验到的冲突以基础设施为核心，在社区边缘团状分布，仅游客体验到的冲突以主街十字路口为核心，沿主街环状分布。文化冲突在空间上基本重叠，呈现以景点和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圈层式分布。环境冲突在空间上基本无重叠，社区居民体验到的该类冲突沿河流的关键节点聚集分布，游客体验到的该类冲突沿主街呈多核心点状聚集分布。可见承载着主客群体共同实践的景点和设施等是冲突的汇集重叠区，而主客群体空间实践的差异导致其感知到的部分冲突未重叠。

③冲突空间分布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旅游开发作为外力进入社区，导致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是冲突空间分布的前提和基础；社区内部的传统建筑被开发为景点与旅游设施，使得社区功能多样化，而功能对空间资源的竞争性占用是冲突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社区难以兼顾主客群体的差异化诉求，造成承载空间功能的物质载体成为冲突空间分布的依托条件。因此，未来旅游开发中应注重社区生产生活功能与游览功能的协同发展。

3.2 讨论

旅游开发在促进乡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旅游接待规模不断提升的同时，使得社区空间兼具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29]，利益相关者在空间功能上的矛盾日益增多，当多群体或不同功能在空间复合或重叠时，往往出现冲突。在景村融合过程中，旅游功能空间不断侵占生活功能空间成为强势空间，造成社区空间秩序重构^[30]。游客和社区居民在实践过程中对空间的诉求日益多样，导致其对旅游开发态度的差异^[27]，成为冲突产生的基础，并具有相应的空间分布规律。了解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能够指导社区资源的合理分配，为社区旅游开发与治理提供实践指导。

本文通过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获取数据，从主客视角探究景村融合背景下旅游社区冲突构成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冲突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社区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冲突可以归纳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冲突，但两群体在各类型冲突的构成类目上不同，这与主客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有关。同时本案例发现文化资源是社区居民与游客共同关注的内容，而管理者在文化资源保护上投入的不足，造成主客群体均在承载社区文化的空间上感知到对管理者的负面情绪，表明资

源的分配会成为不同群体感知冲突的潜在诱因，丰富了冲突是资源稀缺基础上的利益需求矛盾这一概念内涵^[31]。因此，在未来的旅游发展中加大对文化资源保护与展示的投入是案例地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此外，本文在冲突类型划分时将社区居民与游客体验到的冲突在统一标准下进行归纳，具有可比性的同时弥补了当前多从单一群体视角开展研究的不足，能较为全面地涵盖乡村旅游社区的冲突类型^[14,32]。

生态位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竞合关系研究，为从多群体视角理解社区内部的空间竞争及冲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33]。侗寨作为典型的村寨型景区，旅游开发后旅游空间与生活生产空间二位一体^[34]，社区空间资源的利用被旅游业主导，传统民居、鼓楼、风雨桥等建筑由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主客共享的游览空间^[30]，主客群体对空间利用的重叠使得生态位相似，导致群体间对空间资源的排斥性竞争。侗寨沿河分布的地理特征决定了社区内主要建筑沿河布局，导致旅游开发后景点与游览空间也呈带状沿河流与主街分布。游览空间的部分规范使主客群体的行为均受到影响，使主客群体感知到的管理冲突在游览空间内呈带状重叠分布。此外，游览空间内部分规范仅对游客产生影响，而仅影响社区居民的规范位于社区边缘空间，故部分管理冲突并未重叠。景点承载着社区的传统文化与建筑特色，而管理者在打造过程中对文化保护与开发不足且割裂了建筑与稻田环境的联系，使主客群体感知到的文化冲突以景点为核心相互重叠。独洞河是社区居民主要使用的空间，导致其体验到的环境冲突主要沿河分布；主街等游览空间是游客主要关注的空间，使其体验到的环境冲突主要沿主街分布。此外，部分区域无明显冲突分布主要是由于社区居民与游客对空间资源的利用相对协调。社区居民和游客体验到的冲突类型具有相似性和空间重叠性，这与已有研究认为，多人群共同关注的地点容易产生态度集聚和冲突的结论一致^[27,35]。

本文基于景村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从游客与社区居民视角出发，将旅游社区内主客体验到的冲突划分为管理冲突、文化冲突、环境冲突三类并识别其空间分布特征，是从多群体视角理解社区冲突的有益尝试，但缺乏对管理者的调查，该群体拥有更为专业的知识、深度的认知，或将提供更具广度、高度的理论视角，涵盖该类利益主体的社区冲突有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102-118.
- [2] 陈志军, 徐飞雄.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以关中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2):231-240.
- [3] 左冰, 保继刚. 旅游吸引物权再考察[J]. 旅游学刊, 2016, 31(7):13-23.
- [4] 杨亚东, 罗其友, 杜娅婷,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 现状与对策[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3):232-239.
- [5] 孙九霞, 黄秀波. 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中的空间协商与利益博弈——以丽江白沙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2):40-48.
- [6] Cornet 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stance in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2:29-43.
- [7] 高春留, 程励, 程德强. 基于“产村景”一体化的乡村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武胜县代沟村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5):90-97.
- [8] 王维艳. 乡村社区参与景区利益分配的法理逻辑及实现路径——基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视角[J]. 旅游学刊, 2015, 30(8):44-52.

-
- [9] 李王鸣,高沂琛,王颖,等.景中村空间和谐发展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为例[J].城市规划,2013,37(8):46-51,59.
- [10] 孙九霞,周一.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J].地理学报,2014,69(10):1575-1589.
- [11] Zhang Y,Lee T J,Xiong Y. A conflict resolution model for sustainable heritage tou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9,21(4):478-492.
- [12] Ma X,Wang R,Dai M,et al. The action logic and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residents' resistanc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2022,51:79-87.
- [13] 钟洁,杨桂华.旅游社会冲突的特征、主体与类型——基于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1):103-106.
- [14] Wang L,Yotsumoto Y. Conflic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2019,70:188-200.
- [15] Tsaur S H,Yen C,Teng H. Tourist-resident conflict:A scale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Management,2018,10:152-163.
- [16] Ward C,Berno T. Beyo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Attitudes toward touris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4):1556-1569.
- [17] 王维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制度增权二元分野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18,33(8):58-67.
- [18] 朱尧,邹永广,柴寿升,等.乡村旅游社区隐性冲突演变机理研究——基于社区居民的视角[J].旅游学刊,2022,37(11):1-14.
- [19] Almeida J,Costa C,Da Silva F N. A framework for conflict analysis in spatial planning for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7,24:94-106.
- [20] Liu C,Dou X,Li J,et al. Analyzing government rol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rom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0,79:177-188.
- [21] 蔡克信,潘金玉,贺海.利益、权力和制度:旅游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1):48-55.
- [22] 王兆峰,腾飞.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协调机制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96-201.
- [23] Curcija M,Breakey N,Driml S. Development of a conflict management model as a tool for improved project outcomes in community base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2019,70:341-354.
- [24] Zhu H,Liu J,Liu H,et al.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boundary identifying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fluence in historic area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Qianmen area,China[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7,63:11-20.

[25] 刘阳, 赵振斌.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7):2086-2101.

[26] 蔡晓梅, 邹小丹, 刘美新, 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5):885-895.

[27] 褚玉杰, 赵振斌, 张铖, 等.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 71(6):1045-1058.

[28] 董敬儒, 焦继宗, 魏宝成, 等. 专题地图制图中双变量等值区域法的应用[J]. 测绘科学, 2020, 45(9):141-147.

[29] 吴清, 冯嘉晓, 陈刚, 等. 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演变及优化: 德庆金林水乡的案例实证[J]. 生态学报, 2020, 40(16):5560-5570.

[30] 李小永, 赵振斌, 李佳乐, 等. 居民视角下民族社区旅游化的空间演变过程及特征——以肇兴侗寨为例[J]. 资源科学, 2021, 43(5):1051-1064.

[31] Teng H.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conflict with Chinese tourists:Does economic dependence matter?[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24(9):978-991.

[32] Li Y, Lau C, Su P. Heritage tourism stakeholder conflict:A case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Chin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20, 18(3):267-287.

[33] 贺小荣, 彭坤杰. 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湖南省城市旅游脆弱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21, 41(4):174-182.

[34] 保继刚, 陈求隆. 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1):43-53.

[35] Paasi A. Regional planning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From bounded spaces to relational complexity[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8):1206-1219.